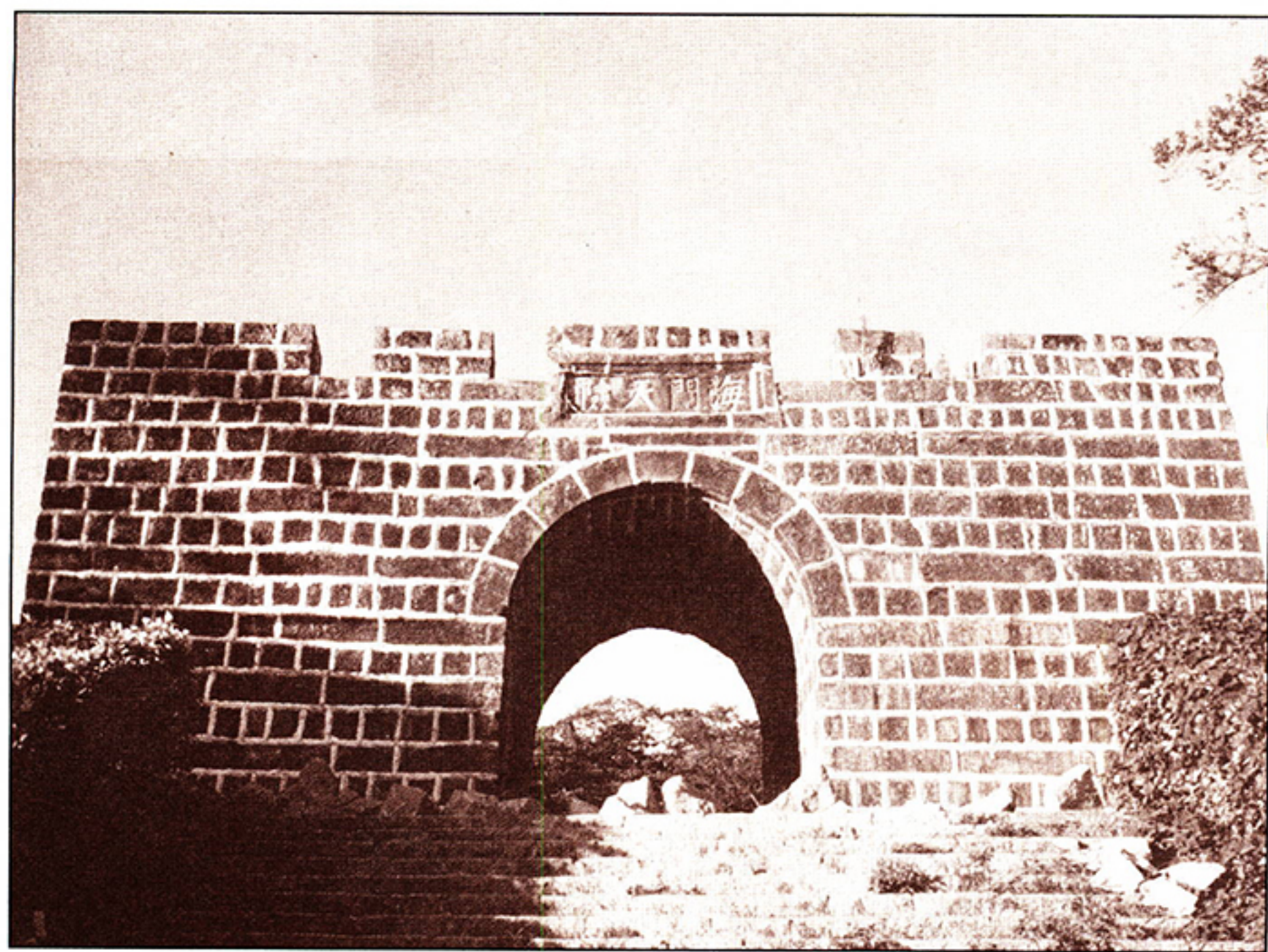


【論述】

清法戰爭中的基隆之役 ——兼論民族英雄墓的由來*

許毓良*



一、前言

光緒10年7月6日(1884.8.26)所爆發的清法戰爭，是清末對外戰爭中少見獲勝多場的戰爭。¹在戰局的變化上，沒有任何一處地方比起臺灣基隆戰場，全出於主帥個人的政治考量——因逕自退兵所導致先勝後敗，並在敗中營造出果敢戰鬥的戲劇性發展。²雖然對於該戰爭討論，之前已累積不少成果；但多偏重史事的描述，實際從戰術的觀點來解讀單一戰役，至今還未曾出現。³本文以基隆戰場為題來撰文的原因有二：其一，該戰役可說是臺灣守軍士氣由盛轉衰的關鍵。爾後清軍雖然力求穩住撤退後的基隆防線，但誠屬事倍功半，並且讓法軍“據地為質”，以利未來的談判。其二，在所有關於清法戰爭的現存遺跡中，只有在基隆還看得到紀念我方陣亡軍士的碑銘。因此從這塊紀念碑的背後來追溯過去，別有一番歷史旨趣。不過相當值得考證，也是

* 許毓良 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。

* 本文為2000年11月至2001年7月，作者參加基隆市市定古蹟——清法戰爭遺址調查研究與修復計劃時的成果(歷史考證)。雖然最後以報告書的方式結案，但有不少內容限於篇幅酌量刪減。因此特別再以全文投稿的方式以就教讀者。

1 光緒10年7月6日清廷因馬尾船廠遇襲，下詔正式對法國宣戰。不過在此之前邊釁已開，例如：光緒9年4月至7月(1883.5~8)黑旗軍與法軍在北越交火。光緒10年1至閏5月(1884.2~6)清、法軍已在北越鏖戰。同年6月(1884.8)法艦砲轟基隆旋被守軍擊退。

2 以往對於劉銘傳逕自從基隆撤兵一事，總認為是欲確保臺北府城的戰略運用。但從《樸園越議》所錄翁同龢於清法戰爭期間與醇親王的密信底稿來看，劉的確有退兵自保的打算。參閱孔祥吉，〈是避敵自保還是高明戰略——劉銘傳撤守基隆新史料辨析〉，《清史研究》，總第25期，1997年3月，頁87~89。

3 關於清法戰爭的專文研究有：胡志堅，〈中法滬尾之役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29卷第1期，1978年3月，頁151~157；許雪姬，〈劉璈與中法戰爭〉，《臺灣風物》，第35卷第2期，1985年6月，頁1~28；吳玫，〈中法戰爭期間大陸對台灣的支持〉，《台灣研究集刊》，總第26期，1989年11月，頁53~60；戚其章，〈劉銘傳撤基援滬與滬尾大捷述論〉，《台灣研究集刊》，總第36期，1992年5月，頁53~60；陳在正，〈中法戰爭前後臺灣的海防〉，《台灣研究集刊》，總第38期，1992年11月，頁72~79；許鼎彥，〈中法戰爭臺灣戰事評述〉，《德明學報》，第10期，1995年2月，頁107~129；梁義群，〈論劉銘傳抗法保臺最佳戰略戰術的選擇〉，《歷史檔案》，總第68期，1997年11月，頁110~116；葉振輝，〈中法戰爭澎湖之役〉，《硤古石》，第20期，2000年9月，頁35~61。

一個有趣的問題是所謂“民族英雄墓”建於何時？或何人所建？從筆者蒐集的諸多史料來看，它非建於清末是一件很明顯的事。至於何時、何人興建，本文將在後面有所交待；而現在則把時序拉回1884年，先從清法戰爭之基隆戰場談起。

二、先勝後敗—清法戰爭中的基隆港灣戰役

法國圖謀越南為時已久，同治元年5月(1862.6)法越簽訂柴棍條約(西貢條約)，可說把整個行動表面化。⁴ 對於該問題清廷不是沒有注意。在清法戰爭爆發前夕—光緒8年3月(1882.4)兩廣總督張樹聲即密奏法、越兵端已起，亟宜通籌邊備以弭後患。⁵ 北京方面對於張的警語非全然無動於衷，不過從隔年9月(1883.10)翰林院編修朱一新再啟奏，告以法國侵逼日盛並籲請速定大計的情況來看，朝廷仍徘徊於和、戰二端。⁶

在這一段期間，臺灣受到東南沿海戰雲密佈的影響，在防務的整頓上也顯得急迫。光緒8年12月(1883.1)福建巡撫張兆棟巡閱臺灣的一段記錄，可讓我們一窺臺防的大概：

……查全臺口岸林立防不勝防，而最要者有四處，南則安平、旗後，北則滬(尾)、基隆，均經設有礮台派勇駐守。…安平、旗後二處礮位俱係明露，…滬尾口外之油車口有礮台基址一所，…臣順途逐加履勘並督飭操練，礮械均屬精利，演放亦上擱(嫻)熟。…駐紮郡城兵勇調集操演，技藝均屬可觀；其餘扼要分紮，聲勢尚覺聯絡。惟勇丁未能一律精壯，

4 不著編人，《法軍侵臺檔·大事年表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92種，頁1。

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，《光緒朝朱批奏摺》，第一一九輯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6年12月)，頁525~526。

6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5年8月)，頁3465~3478。

已諄飭統帶各官汰弱留強、認真訓練，務期勇歸實用，餉不虛糜……。⁷

看來臺灣的防務在當時官員的眼中尚屬持平，而兵力佈防的重點也以臺灣府城(臺南)為主。不過觀其四個要口的守備，只有基隆的防務閩撫未再說明，這是否表示清廷對於該港的認識，還停留在“水勢平穩，洋船可隨時出入”的狀態呢？從光緒10年1月4日(1884.1.31)下達的一道諭旨來看，不排除是有這種可能。該諭旨內容旨在垂詢臺防二件事情；一為鎮將是否得力，另一為兵勇是否足恃。⁸ 很顯然地到了清法快要開戰的邊緣，清廷還未察覺到盛產煤炭的基隆其戰略價值何在。

至於北京方面為何較偏重人事問題而少談防禦佈署，其實跟臺防的官員彼此失和有關。臺灣鎮總兵吳光亮為當時品秩最高(正二品)的軍事將領，然因在光緒9年10月(1883.11)涉嫌侵吞餉項、勒索規費而被奏辦。⁹ 爾後吳又與臺灣品秩最高的文官(正四品)——臺灣道劉璈產生嫌怨，其勢如水火還需吏科官員奏請冀由閩撫移駐來平息。¹⁰ 因此臺灣的人事紛爭，可說是在戰爭未開始即提前引爆¹¹；日後它一直困擾著守軍，使之無法一致對外直到戰爭結束。不過即便如此，臺灣的防務還是在清廷的要求下持續進行。閩浙總督何璟是當時專閩海防的地方大員，他在光緒9年11月至隔年1月(1883.12~1884.2)，多次向北京奏報軍情。以他的觀察基隆、安平、旗後已分別建築礮台，購置洋礮以為守禦，惟滬尾礮台仍在改築，然已下令剋期竣工。再者臺地防

7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9年10月)，頁1417~1420。

8 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1500。

9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，頁3479。

10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，頁3491~3493。

11 光緒10年3月(1884.4)臺灣道劉璈亦被參劾“肆意貪橫，辦防鬆懈”，並被指稱與吳光亮事不合恐致債事。參閱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8年10月)，頁1779~1780。

勇裁減一千六百餘名，僅留六千七百餘名以汰強換弱，不足的兵力著水、陸民團補充。而整個臺灣的防區則劃分為五路：恆春至曾文溪為南路，兵力五千名；曾文溪至大甲溪為中路，兵力三千名；大甲溪至宜蘭蘇澳為北路，兵力四千名；花蓮港至卑南為後路，兵力一千五百名；澎湖為前路，兵力三千名。¹²

從兵力佈署的情況來看，前路與南路可謂重兵雲集，這一種臺灣府城與澎湖連成一氣的防衛模式，實際上是臺灣負責海防的官員追索舊經驗的結果。

¹³ 只不過看似縝密的佈防，不一定能切合實際；要是對當時戰爭的打法與戰略一無所知，守軍的偏防反有孤注的危險。光緒10年3月18日(1884.4.13)，法艦哇爾大號(Ie Volta)到基隆購煤啟釁。據基隆廳通判梁純夫稟報，該事件起因於法艦駛進港口後，隨即有三人上岸登山瞭望。他們除了有繪製地圖的動作外，還想進入礮台“遊玩”，但被該管營官與教習阻攔。翌日法方以遭礮台兵勇冒罵與官方禁售煤炭為藉口，準備砲轟基隆挑釁生事。此事幸賴英駐淡水領事費里德(Alexander Frater)、英籍基隆關代理稅務司費世等的調處才小事化無。整件事清廷處理尚稱明快，然而把它定位為商務糾紛，則輕視了法艦在此進出的真正目的。¹⁴

另外還有一則疑問是當時法方欲強行進入的礮台，到底是基隆哪一座礮台呢？有關基隆各礮台興建的年代，迄今仍未有一致的看法。本文根據三種重要的一手史料，欲澄清當中的若干問題(詳見下表一、表二、表三)。

12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，頁3483~3490、3494~3503、3506~3510。

13 許毓良，〈清代臺灣的海防〉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9年5月，頁8~30。

14 不著編人，《法軍侵臺檔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92種，頁34~36。

表一 光緒朝基隆礮台營建及數量表

編號	礮台名稱	礮台位置	建造者	資料來源
1	獅球嶺礮台	獅球嶺山上(近土地公廟)	—	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收入伊能嘉矩文庫，微卷編號T0021，卷號6-4(手稿及抄寫部分〔四〕)。
2	社寮礮台	社寮庄山上	曹志忠	
3	三沙灣小礮台	三沙灣庄(陸軍經理部山上)	孫開華	
4	大沙灣礮台	大沙灣庄(孤拔海濱附近)	—	
5	仙洞礮台	仙洞庄(棧橋附近)	桂占彪	
6	—	—	—	

備註: 1.調查時間:明治43~44年(1910~1911)。

2.調查人:基隆公學校訓導蔡慶濤。

3.當時還有一處礮台位於基隆要塞之內無法調查，疑為二沙灣礮台。

表二 光緒19年(1893)基隆礮台營建及數量表

編號	礮台名稱	礮台位置	礮台火力配置	管帶(指揮官)	資料來源
1	獅球嶺礮台	獅球嶺	5吋口英國前膛礮1尊	姚喜明	日本東洋文庫藏抄本《臺島劫灰》；轉引曹永和總纂，《日據前期臺灣北部施政紀實—經濟篇/軍事篇》(臺北：臺北市文獻委員會，1986年10月)，頁554~555。 ※《臺島劫灰》為乙未割臺時，清方移交給日方的清冊之一。
2	社寮礮台	社寮島	12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1尊 10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2尊 8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2尊	陳華亭	
3	基隆小礮台	二沙灣	8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1尊 6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1尊	莊蓉江	
4	頂石閣礮台	大沙灣	8吋徑口英國後膛阿姆斯脫浪礮1尊 12生特德國博洪礮2尊	陳海珊	
5	仙人洞礮台	仙洞	4吋半徑口英國瓦瓦司後膛礮1尊	陳海珊兼管	
6	紗帽嶺礮壘	紗帽嶺	4吋半徑口英國瓦瓦司後膛礮1尊(此砲礮由南琛兵輪邊礮拆解安裝)	陳海珊兼管	

表三 光緒20年(1894)基隆礮台營建及數量表

編號	礮台名稱	礮台位置	礮台火力配置	司令 (指揮官)	資料來源
1	獅球嶺礮台	獅球嶺	12寸前裝加農礮1門 6寸前裝加農礮1門	包宗光	入江文太郎，《基隆風土記(昭和8年/1933年排印)》(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)，頁91~92。
2	社寮礮台	社寮島	12寸安式加農礮1門 10寸加農礮2門 8寸加農礮2門	陳華廷(亭)	
3	沙元小礮台	二沙灣	8寸安式加農礮1門 6寸安式加農礮1門	莊長勝 (蓉江)	
4	頂石閣礮台	大沙灣	8寸安式加農礮1門 21珊米克式加農礮2門	陳學財 (海珊)	
5	仙人洞礮台	仙洞	12珊米克式加農礮1門 15珊米克式加農礮2門	劉燕	
6	—	—	—	—	

備註: 1.該書對乙未日軍攻臺記敘頗為詳細。
 2.這五處礮台還各配置有若干輕礮。
 3.除了這五處之外，還有廢礮台配置舊式礮。
 4.“沙元”小礮台為“沙灣”之諧音。

從上面三種史料來看，最重要的是伊能文庫所藏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以及東洋文庫所藏《臺島劫灰》一書。兩者的史料性質，一是民間採訪錄，另一是類似官書，彼此恰好能相互對照。尤其是前者的記載，亦把礮台的建造者都寫入；當知採訪的時間距離清法戰爭不遠，其受訪者的口述還有一定的真實性。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兩者記錄的礮台位置，其地名雖然都是一樣，但地點則不完全一樣。例如：地圖中的大沙灣、二沙灣礮台，清法戰爭時均接近海邊，但乙未戰爭時都位於山上。¹⁵ 然而無論如何到乙未割臺為止

15 清法戰爭時期的地圖可參閱2001年編纂的《基隆市市定古蹟：清法戰爭遺址調查研究與修復計劃》；乙未戰爭時期的地圖可參閱許佩賢譯，吳密察導讀，《攻台戰紀—日清戰史台灣篇/附冊地圖集》(臺北：遠流出版公司，1995年12月)。

，基隆所設立礮台的地點至少有七處—獅球嶺、社寮、二沙灣、三沙灣、大沙灣、仙洞、紗帽嶺。但作者認為前述提到法艦所窺伺的礮台，最有可能是蔡氏沒有記錄的二沙灣礮台。主要原因是它的位置與事發地點最為吻合。該礮台的建造者—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前後共有三次來臺。第一次為光緒2年12月至4年11月(1877.2~1879.1)，第二次為光緒5年10月至7年11月(1879.12~1882.1)，第三次為光緒10年2月至12年3月(1884.3~1886.4)。其中又以第二次來臺最為重要。因為在福建巡撫勒方鐸的支持下，在鰲母島附近興建了所謂東岸礮台—二沙灣礮台。¹⁶ 根據法艦致我方信件供稱，艦上的船員是在“東邊礮台”受辱，所以應該指的是二沙灣礮台。¹⁷

也許會有人問道：三沙灣礮台鄰近二沙灣礮台，或許也有可能案發在三沙灣礮台？雖然三沙灣礮台的建造者亦為孫開華，但該礮台建造的時間已遲至光緒11年(1886)清法戰爭結束後才動工。所以不可能是三沙灣礮台是很明顯的。¹⁸ 另外社寮礮台的建造者，蔡氏記為曹志忠。實情是曹雖然早在光緒8年5月(1883.7)因換防而抵臺¹⁹，且在隔年9月(1884.10)被擢陞為福寧鎮總兵統率臺灣北路兵防；但該礮台的建造者卻是在10年閏5月底(1886.7)，因劉銘傳的要求才動工。²⁰ 至於仙洞礮台的建造者是桂占彪。桂的官職是提督銜留閩差委總兵，而從他替孫開華建築新中營營舍來看，或許在臺的時間與孫同。²¹ 最後是三個沒有記載建造者的礮台—大沙灣、獅球嶺、紗帽嶺。對於

16 許雪姬，〈抗法名將孫開華事蹟考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36卷第3、4期合刊，1985年12月），頁239~256。

17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37。三沙灣礮台建造的時間，史料並無明確說明。不過從清法戰爭的記錄來看，

18 三沙灣礮台建造的時間，史料並無明確說明。不過從清法戰爭的記錄來看，不管是我方還是法方，都沒有修築三沙灣礮台的記載。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孫開華在清法戰爭結束後才興建。

19 岑毓英，〈由黔運閩炸礮仍存臺備用片〉；摘自諸家《臺灣關係文獻集零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309種，頁133。

20 〔清〕劉銘傳撰，馬昌華、翁飛點校，《劉銘傳文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7年7月），頁90~91。

21 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頁19。

前者，蔡氏其實在〈基隆孤拔海濱事蹟〉與〈基隆沿革史資料〉二文有所透露。它的建造主要是基於防俄，因此在光緒7年3月(1881.4)由孫開華麾下右翼營官龔占鼈，委由候補知州楊某督工造築。²² 對於中者，作者的考證應是在光緒8年(1882)，伴隨著福建巡撫岑毓英巡臺的記名提督何秀林所建。²³ 對於後者，雖然能爬梳的資料最少，但從它配有南琛艦砲的情形來看，它建築的時間最早不會超過光緒12年(1886)。因為該艦是在光緒9年(1883)由德國購回，此後二年便投入清法戰爭。²⁴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七處礮台(另加二沙灣一處)，昭和8年(1933)排印的《基隆風土記》也還記有廢礮台的事情。所以想當然爾，該地前後曾出現的礮台不止這六處。但總數共有幾處礮台，這將透過戰爭的描述把它們呈現出來。

總之，礮台成為海防守口的利器，則是當時稍諳洋務官員的一種想法。²⁵ 經過法艦這次在基隆滋事的刺激，清廷也開始提防法方有可能奪踞口岸為質的詭計，因此密諭閩、粵官員小心行事。²⁶ 光緒10年4月(1884.5)閩浙總督何璟特別針對法艦的動態，以及臺灣防務的缺失提出報告。他認為臺灣現存的二萬兵力還不足以應付危局，且調撥該島的萬年青、伏波、永保、琛航四艘兵輪，還遠不及法艦的威力。因此應變之道在於先辦水、陸團練，一旦有

22 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頁2、12。

23 岑毓英，〈修理大甲溪及基隆營礮報銷片〉，《岑襄勤公遺集》(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69年8月)，頁1911。

24 姜鳴，《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志(1860~1911)》(上海：三聯書店，1994年12月)，頁98、106、116、120~122。

25 《光緒朝朱批奏摺》，第一一九輯，頁541~542。

26 事實上早在光緒9年12月22日(1884.1.19)，北京的同文館已把法國報紙催逼法軍及早佔領臺灣、瓊州、舟山的訊息給翻譯出來；但過了三個月之後，清廷才正視這項消息。參閱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13~15；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8年10月)，頁1781~1782。

警則堅守各砲台抵禦，待敵艦進入水淺處再出動杉板應戰。²⁷ 何的戰術在今日看來簡直是以卵擊石，若真的照章辦理即有全軍覆沒之虞；但這就是當時對海戰的認知，一種以陸戰延伸的手法去操作。

然不同於其他官員的想法，屬於淮系集團的前直隸提督劉銘傳，對於戰爭勝負取決於火力的認識，比起他的同僚們還進步許多。劉在同年閏5月2日(1884.6.24)上奏，直言我方須從兵將、器械、砲台、兵船興革才有機會獲勝。²⁸ 二天之後，劉即被賞與巡撫銜並命督辦臺灣事務。²⁹ 前文提到的臺灣官員彼此不和問題，事隔半年仍未止息。因此從北京的觀點來看，除非能簡放統籌戰局的大員，不然實無更好的解決方式。³⁰ 以淮系首腦李鴻章的政治實力，再度啟用他手下的強將實不讓人感到意外。³¹ 劉在接受任命後，旋即在同月14日(7.6)行抵天津與李會商軍情，四天後與從銘軍舊部挑選的一百四十餘人渡臺；24日(7.16)抵達基隆上岸，四天之後移駐臺北府城。³²

劉銘傳對於臺灣當時的防務，以全臺總共四十營，但臺北僅佈署九個營最表不滿。他除了增調舊部記名提督章高元督率二營來臺外，亦下令在基隆趕造社寮與岸鱗墩砲台，並商請兩江總督曾國荃調援“澄慶”、“登瀛洲”、“靖遠”、“開濟”四艘兵輪。³³ 劉的擔心是正確，因為法軍正準備先發制人

27 《光緒朝朱批奏摺》，第一一九輯，頁546~548。

28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5年8月)，頁3568~3588。

29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790。

30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四輯，頁3552~3566。

31 馬昌華主編，《淮系人物列傳—李鴻章家族成員·武職》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5年12月)；同前註，《淮系人物列傳—文職·北洋海軍·洋員》。

32 〔清〕劉銘傳撰，馬昌華、翁飛點校，《劉銘傳文集》(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7年7月)，頁88~90。

33 臺北的九個營包括福寧鎮總兵曹志忠的“霆慶營”六營，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的“擢勝營”三營，隨後又有章高元的“武毅營”二營加入。不過整個計劃僅有章高元部在劉的掌握下完成，參閱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90~93。

對基隆展開轟擊。同年6月14日(1884.8.4)，法國遠東艦隊副司令官李士卑斯(S.N.J. Lespés)率領兵船四艘兵船駛近基隆。李氏佯稱清法和議不成，要在次日上午八時砲轟守軍。劉在15日黎明於臺北府城接到情報後，即火速趕往前線督戰，但行至半途已聽聞法艦轟擊大沙灣砲台的砲聲。該砲台營官姜鴻勝本欲還擊，但所配備的五尊洋砲均採固定砲座無法迴旋，因此在法艦的側轟下僅二個小時即傷亡六十餘人。劉銘傳自知我方火力無法匹敵，遂想以誘敵深入的方式進行陸戰。隔日上午九時法軍在艦砲的掩護下，有四、五百人趁隙登陸；以半數直攻從海岸退守至田寮港二重橋的曹志忠部，再以半數紮營於曹部北方的山頭。雙方戰至中午，劉派令章高元與同樣也是記名提督蘇得勝率百餘人由東路抄截，復派已革游擊鄧長安率六十人由西路繞擊，而曹志忠與副將王三星再率領二百餘人出陣，三路夾攻大敗法軍、摧毀山頭營舍並驅趕他們回船。³⁴

法軍不得志於基隆，遂把兵鋒指向福州船政局。事實上在光緒10年閏5月22日(1884.7.14)，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孤拔(A.A.P. Courbet)即率領數艘兵船駛入閩江窺伺。同年7月3日(8.23)法方以迅速宣戰的手法，即刻轟擊馬尾造船廠並毀船九艘。³⁵三日後清廷下詔宣戰，清法戰爭正式展開。7月9日(8.29)又有法艦三艘近泊基隆，並連續二日對守軍發砲猛轟。同月14、20日(9.3/9.9.11)淡水亦出現法艦蹤跡，不過在28日(9.18)以前，近泊基隆的三艘法艦仍持續滯留，並帶給守軍攻擊上的壓力。³⁶清廷此時密諭劉銘傳若有辦法

34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611~3617；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796~1797、1810~1811；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收入伊能嘉矩文庫微卷編號T0021，捲號6-4(手稿及抄寫部分〔四〕)，頁3；劉璈，《巡臺退思錄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21種，頁268~269。

35 此役清方參戰兵船共11艘，船政大臣何如璋奏報只損失7艘；但事實上是包括揚武、福星、福勝、建勝、飛雲、濟安、琛航、永保、振威在內9艘。參閱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124~127。

36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98~99。

，宜以塞港的方式對付法艦。³⁷但這非易事。因為法艦日以巨砲轟擊，守軍早遠離海岸退入山邊。而二個星期之後，又有一場更大規模的陸戰即將爆發。

8月12日(1884.9.30)，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孤拔率領軍艦9艘、運輸艦22艘來襲。隔日(10.1)上午六時，法方以近三千名之眾登陸港口西岸的仙洞庄。章高元率領駐紮該地的恪靖巡緝營、霆慶中營、武毅營二百餘人邀擊於牛稠港山上。雙方會戰二個小時，法軍從山巔抄截，迫章部退出山口；至下午十時，法軍更猛撲我軍，幸賴副將陳永隆力戰挫敵。然而當夜，劉銘傳卻以滬尾遭法艦5艘砲轟恐陷敵為由，命令大軍拔營援滬並撤退至水返腳(汐止)，僅留曹志忠部三百人駐獅球嶺。因此基隆港灣之戰即在守軍的撤兵下結束，法軍可謂以極小的代價就有豐碩的戰果。³⁸

如前面所述，劉的決定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都充滿了爭議；但不管如何，法軍畢竟還是佔領了基隆。所以從法方的資料來看6月15日與8月13日二場戰役，或許可以澄清一個很重要的問題—清軍在開戰時到底構築幾個礮台？³⁹法人E. Garnot在清法戰爭結束後，根據自己從軍的經歷寫了一本“遠征史”，書中有不少一手的記載。⁴⁰除了獅球嶺、紗帽嶺、社寮三處礮台少具爭議性外，透過該書再對照另外四處礮台—大沙灣、二沙灣、三沙灣、仙洞，

37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822。

38 根據劉銘傳的奏報，法艦全數只有11艘，這與蔡慶濤的調查略有出入。作者採用蔡的資料原因除了敘事更為詳盡之外，蔡的報導人想必也親歷這場戰爭。參閱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00~101；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頁3；《巡臺退思錄》，頁284。

39 對於這個問題，現任職於新竹縣政府民政局禮俗文獻課的劉敏耀先生有不少考證，整體來說實有助於了解基隆所有礮台的歷史。不過對於幾處礮台的位置，或許容作者再提出不同的看法。參閱劉敏耀，《基隆砲臺手冊》(基隆：基隆市立文化中心，2000年8月)；劉敏耀，〈基隆砲臺研究〉，《臺灣文獻》，第52卷第1期，2001年3月，頁157~162。

40 參閱〔法〕E.Garnot著，黎烈文譯，《法軍侵臺始末(L'Expédition française de Formose, 1884 - 1885)》，臺灣研究叢刊第73種。

可以驗證作者之前的看法。從E. Garnot所附的地圖來看⁴¹：首先三沙灣礮台即無繪製在地圖上。因此該礮台在清法戰爭結束後再被建造是可信的。其次關於二沙灣礮台的建造，法人在地圖上所稱的Fort Fortin剛好補充蔡氏調查的不足，同時也證明戰爭爆發時該礮台早已存在。⁴²其三，從法方稱呼守軍有一處“新礮台(Fort Neuf)”配有五個砲眼。從它是法軍最重要轟擊的目標來看，其實指的就是也配有五尊洋砲，並與法軍周旋許久的大沙灣礮台。最後在仙洞庄除仙洞礮台外(當然劉銘傳又再新建岸麟墩礮台)，另有仙洞鼻礮台。⁴³

三、相持不下一清法戰爭中基隆外圍丘陵戰役

8月15日(1884.10.3)法軍差不多佔領基隆港港埠，而住在街肆的百姓相率逃走以致十室九空。法軍看到此情形也感到驚訝，為避免清軍潛伏狙擊乃縱火燒屋，最後終於確定敵軍已全數撤走。⁴⁴這一次由孤拔主導的軍事行動，有記錄的兵額是2250人。雖然法軍已攻佔基隆，但礙於輜重兵嚴重不足，使得他無法乘勝追擊攻入臺北。因此往後的四個月，基本上以固守陣地、待機進攻為主；尤其在20日(10.8)入據滬尾失利後，更顯得不得失守的重要。

41 該地圖收錄於2001年編纂的《基隆市市定古蹟：清法戰爭遺址調查研究與修復計劃》，但對該地圖的考證可參考《基隆砲臺手冊》，頁38。

42 Fort Fortin劉敏耀先生把它解讀為三沙灣礮台，另一個被法方稱之為Fort Neuf的礮台，劉亦解讀成二沙灣礮台。不過據作者查閱日人在基隆築港前繪製的海灣圖，並對照法方的古地圖來看，Fort Fortin應該座落在二沙灣，Fort Neuf應該座落在大沙灣，當時還沒有所謂的三沙灣礮台。參閱不著編人，《基隆築港誌》(無出版地：無出版地，1914年)；不著編人，《基隆築港要覽》(臺北：基隆築港出張所，1928年4月)；《基隆砲臺手冊》，頁31。

43 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頁4

44 《基隆地方研究資料》，頁4。

當時法軍的佔領區是由西方、南方、東方三條防線圍繞著。在西方防線方面，法軍有Clément與Thirion二個砲兵陣地。前者位於球仔山，為利用清軍遺留的中央砲台稍加修葺而成；後者位於石皮瀨山頭，本來是控制著往金山的孔道，但因防守的士兵苦於痢疫不久便棄守。在南方防線方面，法軍以二度易名的Leverger與淡水砲台為重心(其實就是獅球嶺砲台)，再搭配西北方以及西南方被稱為“鷹巢”的堡壘。東方防線方面，總共有三個砲兵陣地——即位於今主普壇的Fort Ber、位於今中正公園的Fort Gardiol、位於今中正國小的Fort Bayard。指揮部設在也是被稱為A點(Point A)的Fort Bayard，它有一條電報線通往位於二沙灣被臨時充做軍醫院的海關關舍。前述提到的所有陣地，在法軍看來都不是最佳的選擇。雖然它們都很接近基隆港灣，但山頭的海拔並不高。在其後方還有更高的山丘可以俯視它們。法軍也有想過攻佔這些更高的山丘，然礙於兵力有限，無法再進一步擴大自己的防線。⁴⁵

在清軍的陣營中，8月20日(10.8)重挫法軍進攻滬尾的行動，算是把從基隆不戰而退的劣勢再扳回一成。⁴⁶至此清、法雙方攻勢停頓，逐漸呈現出一種相持不下的狀態。二天之後清廷一連下了三道密諭，除了命令在滇、黔的清軍伺機進兵，以牽掣在基隆的法軍之外，亦調前陝甘總督楊岳斌帶勇援臺。不過最讓人感到好奇的是第三道諭令的內容，文中提及法軍佔領基隆後，即雇募當地土勇為兵。因此北京方面指責劉銘傳為何讓法方先聲奪人，並要求趁敵喘息未定與臺灣道劉璈聯絡反攻。⁴⁷事實上北京先前冀望調派劉銘傳來臺，以弭鎮、道不合的紛爭，現在反而落空。因為他引起另一場更大的人事

45 對於該段任何提及法軍砲台、砲兵陣地的考證，除了南方防線的Fort Bayard之外，均參照劉敏耀先生所著一書。參閱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18~37；劉敏耀，《基隆砲臺手冊》(基隆：基隆市立文化中心，2000年8月)，頁37~42。

46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01~105。

47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850~1852。

風爆一湘、淮畛域。⁴⁸ 此刻待在臺北的劉銘傳要獨自面對基隆法軍的壓力。當時劉的困境是軍餉、器械、兵源全部不足。對此清廷亦下令東南沿海的督、撫設法接濟，但以當時緊急的狀況仍屬緩不濟急。⁴⁹

在北京的認知中，臺灣銀米不缺，且多富戶；尤其是臺北“林姓”家業巨富，可以設法勸輸。實際上這反映著一種對戰場無奈的事實。因為早在戰爭爆發之初，地方官員早有興辦水、陸團練之舉；然而現在還為了籌餉、拉伕而疲於奔命，可見得該方法有它實際的困難。迫不得已清廷也開出一些獎勵，如：紳民募眾逐法者，以五等之爵封賞；所費口糧立功後報明補發；捐餉者減成從優，成功再撥糧一年。⁵⁰ 從清廷追溯8月13日(1884.10.1)基隆戰事的記錄來看，我方在清理戰場時，不管是從俘虜的口中，還是從被擊斃的屍體均發現有為數不少“華人”。根據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曾國荃的說法，他們是法方在東南沿海口岸以雇工為名誘騙充軍。雖然曾言之鑿鑿，但從E. Garnot的回憶錄來看，完全無提到這類事情，有的只是從東京(越南北圻)、交趾支那(越南南圻)調來的援軍。⁵¹

從清廷的檔案來看，劉銘傳似乎還能領導臺北軍民來抵禦法方，但在淡水關稅務司法來格(E. Farago)眼中卻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。9月2日(10.20)他給總稅務司赫德(Robert Hart)的報告提及：“劉爵帥往日英名今已全失，曾令淡水、基隆二處督兵人退兵，皆抗而不遵。又有自回臺灣府之意，乃為鄉

48 許雪姬，〈劉璈與中法戰爭〉，《臺灣風物》，第35卷第2期，1985年6月，頁1~28。

49 吳玫，〈中法戰爭期間大陸對台灣的支持〉，《台灣研究集刊》，總第26期，1989年11月，頁53~60。

50 臺北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(臺北：故宮博物院，1999年10月)，頁1596~1597。

51 此外還有第三種說法。根據淡水關稅務司法來格(E. Farago)給總稅務司赫德(Robert Hart)的報告，這些人都是中國的天主教徒。參閱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854~1855；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20~21；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216~217。

民所禁，不得出衙。”⁵² 法氏為英國人，當時屬於中立國的官員，他的記錄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有趣的是劉不得出衙形同軟禁的局面，與臺灣馬上就要面臨到的處境相似。也是在同日，孤拔宣佈封鎖臺灣從南岬(恆春半島)迤北至蘇澳的港口、海灣，並且有權檢查第三國的船隻或驅逐他們。⁵³ 這個破天荒的決定可謂臺灣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因為之前該島雖也面臨過閩粵海盜的騷擾，或者二次鴉片戰爭的衝擊；但這種壓制式的封鎖還是頭一次，並且是除了花東海岸之外全都算入。⁵⁴

法軍的這個舉動，在進行之初已收到了效果。9月7日(10.25)劉銘傳發出的電報指稱：北京方面一直要求他招募的土勇，現已募集五千人，但因為餉械不足、藥品缺乏、土匪四起、疾病大作，能戰者還不足三千人。⁵⁵ 所以在九月份，法方趁機放出和談空氣試探。11日(10.29)法國新報館主筆嘎馬，代替總理茹斐禮(Jules Ferry)與清廷駐英公使曾紀澤的翻譯官馬格理(Halliday Macartney)做非正式的接觸。法方提出四點要求：同年4月與北洋大臣李鴻章簽訂的〈天津簡約〉仍屬有效；清軍撤出東京，法艦撤出中國洋面；越南諒山之役法國不索兵費；臺灣由法軍駐守。⁵⁶ 該協議可說要中國做極大的讓步，一些京官如：禮部侍郎尚賢、光祿寺卿沈源深均上奏朝廷切莫接受。⁵⁷ 當然事後清廷也沒接受，一為此時它仍相信有把握獲勝，但得先解決眼前的問題。

在對付法艦封鎖的問題上，調派一切可動用的兵輪援臺，則是被認為可行

52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214。

53 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39。

54 〈清代臺灣的海防〉，頁51~52、162~171、204~210。

56 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620~1621。

56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298~310。

57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696~3707。

的方法。⁵⁸ 但不管是北洋大臣還是南洋大臣，總以固守汛地之詞推託。正巧10月17日(1884.12.4)朝鮮發生“甲申政變”，李鴻章遂有藉口把援臺的兵船全調到朝鮮。如此只剩曾國荃的南洋水師能擔負這個重任。曾在12月3日(1885.1.18)派出“開濟”、“澄慶”、“馭遠”、“南琛”、“南瑞”五艦援臺。十天之後孤拔親自率法艦六艘邀擊於浙江壇頭洋面。結果前二艘兵輪被擊沉於三門灣石浦港，後三艘則逃往鎮海港，整個馳援行動終告失敗。⁵⁹

在增進我方士氣的問題上，9月11日(10.29)清廷實授劉銘傳為福建巡撫。⁶⁰ 此舉象徵著北京對劉的信任與看重，不過實際有助益的還是兵源與餉源的穩定。除了前文提到臺北“林家”——三品卿銜候選道林維源之外，前內閣中書臺北紳士陳霞林、候選知府嘉義紳士陳熙年、郎中彰化霧峰紳士林朝棟、郎中新竹紳士林汝梅俱成為官府眼中的大戶。然而他們出力彼此有所不同。陳霞林、陳熙年、林朝棟、林汝梅辦理團練算是與清廷密切配合，林維源則是以躲避戰火為由內渡廈門，再以分期繳付的方式消極拒絕。⁶¹

在軍情處理的問題上，對於劉銘傳不戰而棄守基隆的舉動，使得往後三個月陸續有官員上奏議處。不過他們也都建議最好能讓劉剋期進剿、將功贖罪。⁶² 事實上從日後的檔案發現，8月13日的這一場戰役前線官員過於渲染。最明顯的是李鴻章從上海所得的消息，均是我方斬將奪旗，以及越二日後守軍反攻擄得軍械無數的虛假戰報。⁶³ 再者，對於孤拔陣亡的訊息，也時常以訛

58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690~3691。

59 姜鳴，《龍旗飄揚的艦隊——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》(上海：交通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7月)，頁169~175。

60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874。

61 同治7年(1868)未裁兵加餉以前，臺灣綠營每年的經費約二萬兩，以淡水廳0.69兩對1佛銀的比率來計算，約折合佛銀28912圓，而當時清廷即要以林維源認捐洋圓二十萬。參閱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692~3695、3851~3853、4155、4162；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12。

62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933~3977。

63 李鴻章，《李文忠公選集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31種，頁422~423。

傳訛見於奏報、電稿中⁶⁴；而滬尾一直在我方控制的情形，也屢被誤傳為失守陷敵。⁶⁵

在兵防調動與佈署的問題上，法軍的東、南、西三個防線成為清軍急需突破的目標。由於各部見劉銘傳無急攻基隆的計劃，臺北府知府陳星聚乃慫恿曹志忠發動反攻。9月14日(1884.11.1)上午三時，曹帶隊前往法軍南方防線的獅球嶺砲台，甫至山下正準備夜襲九等(弓)坑敵營時就被發現。據E. Garnot的描述，曹部主要是想爭奪Thirion砲台；清軍在法軍的阻止下暫時放慢攻擊，但在四個小時後又想以包圍戰術環攻“鷹巢”堡壘。不過法軍交叉射擊的火網畢竟厲害，我方共傷亡四十餘人仍徒勞無功。爾後劉銘傳命令曹駐紮五堵水陸要隘不得再輕進，但鑒於麾下六營傷亡、疫病頗大，准其在當地招募二營土勇。雖然有時守軍會再趁夜至敵營摸哨，但該攻擊是我方在同年12月底(1885.2)以前規模最大的一次。⁶⁶因此在這一段期間，清軍均以防守為主，而各部的駐防地點如下表四：

表四 光緒10年9至12月(1884.10 - 1885.2)基隆附近清軍各部駐防地點表⁶⁷

編號	各營名稱	指揮官姓名	駐防地點	備註
1	暖暖土勇營 (至少300人)	武舉王廷理 捐職周玉謙	暖暖隘口、石梯嶺、烏嘴峰	負責警戒暖暖、深澳
2	霆慶營(部分)	福寧鎮總兵 曹志忠	暖暖	
3	朝棟營(500人)	彰化紳士世襲 雲騎尉林朝棟	暖暖(大牛埔、大水窟)	

64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680；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166~168。

65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245、252、254。

66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996；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頁1910~1915；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67；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44。

67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870、3994~3996。

編號	各營名稱	指揮官姓名	駐防地點	備註
4	霆慶營(部分)	福寧鎮總兵 曹志忠	五堵	
5	五堵土勇營 (二營)	福寧鎮總兵 曹志忠	六堵、大武崙一帶	
6	水返腳土勇營 (二營)	記名提督 蘇得勝	水返腳、六堵	與曹志忠換防，曹大營改駐五堵

根據劉銘傳本人在11、12月及隔年1月(1885.1~3)的奏報，對於增長的兵力有矛盾之處。前兩個月劉向北京方面報告，臺北的總兵力有一萬三千人，扣除滬尾不算，基隆附近有曹志忠六營、蘇得勝與林朝棟等土勇五營(其實從表四看並不止)。然而在光緒11年1月6日(1885.2.20)的奏摺竟匯報，統計滬尾、基隆二處僅有兵四千餘人。其實劉銘傳會如此宣稱，主要是反駁督辦福建軍務欽差大臣左宗棠對其棄守基隆的參劾。不過二人爭辯的焦點有些錯置，劉是解釋因8月份臺北兵力不夠，所以只能選擇比基隆更重要的滬尾防守；但左是指他在9月份已募集土勇千人，早有足夠的兵力反攻卻未行動。⁶⁸ 劉、左二人的說辭均有對錯，前者是避重就輕，後者是沒考慮到餉、械的問題。然而在戰場上清軍一直採取守勢，並提防法軍既即將展開的一連串攻擊。

從清軍的前線記錄來看，法軍的所謂東、南、西三個防線，在他們的眼中其實就是暖暖、深澳、四腳亭、鰲魚坑、六堵、七堵、八堵、九弓山、獅球(毬)嶺、木瓜嶺、佛祖嶺、牛稠山頂、二重橋山頂、大礮台後山等幾個據點。⁶⁹ 9月20日(1884.11.7)法軍連攻清軍暖暖陣地三日。據劉銘傳的說法，當

68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996；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64、114；左宗棠，《左文襄公奏牘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88種，頁44。

69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994；王彥威輯，《清季外交史料選集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98種，頁110~111。

時清軍守將是練董周玉謙，由於周率領的土勇皆是當地人，因此頗能據險而守給敵重創。⁷⁰ 不過法方的記載可不是如此。首先在出陣的日期上，法軍記錄的時間是26日(11.13)清晨而非20日。其次法軍行動的目的在於偵查，並非攻陷敵陣。再次該行動即在同日下午四時結束，僅一位軍官與二位士兵受了輕傷，還未到“重創”的地步。⁷¹ 事實上法軍準備向內陸挺進的工作一直在進行，其中趕修砲車的道路就是明證。⁷² 不過他們陣營內部也有隱憂存在，即持續發生越南傭兵叛逃的事件。據左宗棠收到的消息，9月25日(1884.11.12)即有安南人逃至曹志忠營納降。⁷³ 爾後即便是戰局不利清軍，卻也有投誠潮出現。例如：11月1日(12.17)暖暖土勇拏獲名叫陳番婆的敵探。劉銘傳趁機利用陳再招降十餘名安南人之外，亦把願意投降的敵探、通事五十餘人再留做敵營反間。⁷⁴

10月下旬法軍攻擊變得緊湊。20日(12.7)他們出動攻擊清軍一個名叫“齒形高地”的新陣地。該陣地之所以重要，主要是在淡水砲台、鷹巢堡壘的火網之外，但卻可扼守通往石硬港谷地的道路。法軍先遣部隊有130人，支援部隊200人，在未有砲火的掩護下直接進行拂曉偷襲。雖然他們沒打算久佔，但據法方描述這次行動極為成功。因為它造成清軍三百餘人的死傷。⁷⁵ 不過往後的攻擊就沒有那麼順遂了。23日(12.10)法軍五百餘人再分成兩路，自深澳坑、月眉山來襲擊清軍，但早被慶字前營記名總兵廖得勝偵之而預先做了準備。是日夜晚法軍直撲援梅庄，曹志忠飛告林朝棟、提督銜記名總

70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07。

71 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45~47。

72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901。

73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3930。

74 《清宮洋務始末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914~1915。

75 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48~49。

兵劉朝祐帶兵支援。雙方鏖戰至上午五時，因法軍死傷過多始行潰退。⁷⁶隔日法軍又在大牛埔一帶偵查，25日(12.12)清晨法軍在九弓坑、紗帽嶺的砲兵陣地開始對我轟擊。未幾有法兵千人自獅球嶺、鳥嘴峰、石梯嶺、大水窟殺出，襲擊守軍的烏髻尖陣地。雖然他們全數遭守軍擊退，但又有紅衣悍敵五百餘人，改撲林朝棟所駐紮的大牛埔、大水窟陣地。該役自上午十時戰至下午十時，幸賴曹志忠率兵援救，法軍才遭擊退；而夜半法軍為了搶屍，又被幫帶林朝昌率勇伏擊，損失十餘人。26日(12.13)以後法軍不敢再有行動，僅以港灣軍艦上的大砲遙擊烏髻尖的清軍。⁷⁷

自11月底至12月上旬法軍又陸續增兵二千。據劉銘傳的奏報，這一次法軍的攻擊險些造成守軍全線潰敗。12月5日(1885.1.20)法軍在暖暖附近的大武崙偵查頻繁，曹志忠見該地兵力薄弱，旋命王三星與營官陳士貴各率一營駐防。10日(1.25)清晨，法兵千餘分攻大水窟、圓窗嶺(法軍名“圓形劇場”)清軍陣地；又有別船載兵四百，自八斗趁隙上岸，抄襲深澳坑後路。法軍突破該處土勇的防線後，挺進至暖暖對河之月眉山。林朝棟、桂占彪得知後急忙出陣截擊，營官張仁貴則衝入敵陣實行逆襲；不料法軍人數眾多，張的部隊反被包圍起來。隔日凌晨林朝棟進行突擊，並得廖得勝、營官葉友勝各率楚勇三百來援，張部始突圍逃回。但由於法軍已攻下該地區的制高點一月眉山，所以清軍在暖暖、大水窟的陣地均被擊潰。爾後清軍以廖得勝、張仁貴部反攻月眉山頂，林朝棟部死守大水窟殘餘的陣地，桂占彪與營官蘇樹森死守圓窗嶺陣地。當日中午十二時至下午十時的攻擊，法軍把目標放在圓窗嶺的清軍；此時駐紮於六堵的蘇得勝，急調營官鄧長安率土勇三百與練兵百餘

76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10~111。

77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16~117；《李文忠公選集》，頁464；《清季外交史料選集》，頁137。

人馳援。12日(1.27)黎明曹志忠亦親往前線督戰。雙方戰至隔日下午，法軍攻勢稍緩，但仍設陣於月眉山、圓窗嶺山腳，與在山頂反攻成功的清軍開槍互擊。15日(1.30)兩軍都堅守不出，各在自己的陣地內築壘準備長期對峙。16日(1.31)夜晚，曹志忠、林朝棟夜襲法軍陣地，但不及佔領又退回。20日(2.4)法軍復犯大武崙，營官陳士貴、林則榮率隊邀擊，法軍在死傷二十餘人後撤退。⁷⁸

12月10日至20日(1885.1.25~2.4)的這一場戰事，已讓清軍強烈感受到法軍西、南、東三個防線外擴的壓力。劉銘傳即令曹志忠不惜經費多雇民夫，從大水窟至月眉山一帶十餘里的路程，連夜修濬築牆、挖洞駐兵期能堵截法軍的攻勢。當然這種被動的防禦，證明在數月之後又面臨到敵人嚴苛的考驗。不過眼前最讓前線守軍最感到不便的是缺乏雨中作戰的用具。前述的十天當中，有五天雙方是在大雨中接戰。法軍裝備齊全，即便是下雨也可身著雨衣戰鬥。反觀清軍遍身淋濕，忍饑冒雨；就算是貴為總兵、練董的曹志忠、林朝棟，也只能跣足督戰，泥淖滿身。⁷⁹ 如此反映出清軍在火器不如人的情況下，僅能靠旺盛的士氣做為後盾，並做為這場勝負不明戰爭的唯一憑藉。

光緒11年1月5日(1885.2.19)清廷密諭給劉銘傳，責備為何沒有趁上年12月13日(1885.1.28)孤拔前往浙江攔截南洋五艦時趁隙進攻。⁸⁰ 其實這一段期間即是劉被法軍打的焦頭爛額之際，怎有時間想到“趁隙進攻”。不過上述的大水窟至月眉山的防線，雖然旨在防禦，但完工後反而讓法軍有敵軍進逼的壓力。據E.Garnot的記載，法軍稱呼它為Cramoisy谷地至“桌形高地”防線。而在上年11月22日與12月6日(1885.1.7/1.21)，法方的陣營中調來

78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17~119。

79 《清季外交史料選集》，頁158~161。

80 《清宮廷寄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三輯，頁1949~1950；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343、345~346。

了二個生力軍—由罪犯組成名為“西風”的非洲大隊，以及最負盛名的外籍兵團。⁸¹ 這二支部隊在投入戰場之後，即將展現可以改變戰局的驚人表現。⁸²

光緒11年1月14至17日(1885.2.28~3.3)統領恪靖等營的營官王詩正、陳鳴志，以及統帶銘字等營的營官聶士成分別從嘉義布袋嘴、卑南上岸並率軍抵達臺北。⁸³ 21日(1885.3.7)幫辦福建軍務欽差大臣楊岳斌亦在臺灣後山的卑南登陸。⁸⁴ 此舉顯示法方對臺的封鎖其實存在著漏洞。清法雙方新一波的援軍既然都已抵達，在攻守上理應是勢均力敵才對。不過法軍卻以上一年的攻勢為基礎，準備再發動更大一波的強襲，欲廓清基隆附近的清軍。

1月18日(3.4)法軍故技重施，以輪船四艘裝兵於八斗登岸，潛行偷襲月眉山後的清軍。曹志忠、劉朝祐派七百人把守戲台山，堵戰一日即刻飛書告急；此時防守六堵的蘇得勝分五百人守竹枝寮，另外派五百人火速趕往赴援。隔日上午十時，法軍兵分三路由枕頭山、竹篙山、龍潭堵進擊；而首當其衝的是防守在此處的曹志忠、蘇得勝二部。由於曹已派三百人駐紮戲台山，二營兵力守大武崙，正好中了法軍聲東擊西之計。不得已曹又急忙把原先駐守月眉山各隘的三百人抽回，集中兵力把守月眉山到深澳坑的十里長牆。雙方戰至中午十二時，法軍突然由深澳坑直衝長牆之外並突破戲台山防線，頓時曹、蘇二部腹背受敵，守軍立刻陣腳大亂並後撤。法軍亦迅速沿著長牆挺進至月眉山，爾後再分成多路出擊。其中一路配合東方防線的砲兵，反過來肅清在深澳坑的清軍，其餘圍攻月眉山頂的清軍。駐紮在此的廖得勝部，大半已被曹志忠調至他處，僅靠劉朝祐及時來援的三百名土勇抵擋，但仍捱不住敵

81 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56~63。

82 對於法國外籍兵團的研究可參閱Timothy J. Kutta, "The French Foreign Legion", Strategy & Tactics, issue 200, (Nov./Dec., 1999), pp.4-14.

83 《清季外交史料選集》，頁152、173。

84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394。

人猛烈的砲火，紛紛棄守陣地退至山下。同日曹志忠、蘇得勝、劉朝祐、廖得勝均把殘餘的兵力，暫行駐紮於新煤廠。⁸⁵

清軍在深澳坑與月眉山的陣地均已淪陷，表面上由林朝棟駐守的大水窟，以及由蘇樹森駐守的四腳亭看似無恙。不過法軍早已佔領整個戰場的中樞要地—獅球嶺，如果他們再從這裏出兵，配合前述的各路軍隊，那殘餘的清軍就有被各個擊破的危險。劉銘傳在1月19日(3.5)夜晚，密調聶士成部赴六堵策應；而在五堵的王詩正部，也於同日調威、良二營前往六堵。劉的目地在於避免法軍真的從獅球(頭)嶺下山，斷了大水窟清軍的退路。然而在獅頭嶺附近的法軍偵查頗嚴，為避免被敵發現，清軍只能以夜行軍的方式快速穿越。原本劉銘傳要在同月21日(3.7)親赴暖暖曹志忠營商討戰守，但前一日下午四時，威、良二營在營官劉見榮、易玉林的帶領下逕自進攻月眉山尾；正值激戰，二營繞至敵後突擊，迫法軍退至山腰而奪回一隘。⁸⁶

1月21日清法雙方再調集大軍血戰於月眉山。由於有前一日的小勝，清軍在當日的攻擊上顯得士氣旺盛。但主力王詩正部畢竟才第一次與敵交鋒，因此採取了最錯誤的戰術—正面猛進。未幾，在敵人的火網下該部死傷慘重；正後撤到月眉山下時，法軍就分成三路追擊。曹志忠、王詩正雖擋住了前面的法軍，但另外從月眉山出暖暖，以及由烏嘴峰出大水窟的法軍，反以左、右包夾的態勢要合圍他們。迫不得已曹、王又退回暖暖基隆河谷南岸。如此在大水窟、四腳亭的清軍反被三面包夾。於是林朝棟、劉朝祐、蘇樹森協同突圍而出，亦不管西路烏嘴峰被敵攻破的事實，在接近下午五時與曹、王的殘部撤回到五堵。⁸⁷

85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21。

86 《清季外交史料選集》，頁174。

87 《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》，第五輯，頁4106~4107。

從18日連續四天的戰役，以林朝棟、劉朝祐部損失最大；而清軍在基隆附近的陣地可說都淪陷了，同時主要防線還退縮至六堵附近的小坑隘口。劉銘傳把他們再重新編派(參閱表五)。不過法軍似乎並沒有再急攻，反而出人意外地在2月13日(3.29)佔領澎湖。⁸⁸ 也許法軍沒有再急著攻入水返腳是對的，因為劉銘傳雖新敗於基隆，但在水返腳附近還有一萬名左右的駐軍。如果法軍冒然前進，可能會造成極大的傷亡，而這對3月1日(4.15)即將就要停戰的結果來說，此代價也是不需要被付出的。清法戰爭基隆戰役到此已近尾聲，4月27日(6.9)清廷與法國簽訂和約，5月9日(6.21)法軍全數撤離基隆代表著這場戰爭的落幕。⁸⁹ 剩下的就只能從豎立在古戰場的紀念碑去追憶了。

表五 光緒11年1月下旬(1885.3)水返腳附近清軍各部駐防地點表⁹⁰

編號	各營名稱	指揮官姓名	駐防地點
1	暖暖土勇營	武舉王廷理	暖暖街之後(靠近河邊)
2	霆慶營	福寧鎮總兵曹志忠	六堵小坑隘口
3	朝棟營	彰化紳士世襲雲騎尉林朝棟	六堵小坑隘口之前的草蘭尖山頂
4	恪靖營(威、良、剛營)	營官王詩正	五堵
5	銘軍與土勇營	福建巡撫劉銘傳、營官聶士成、記名提督蘇得勝、提督銜記名總兵劉朝祐	六堵(往臺北府大路)
6	土勇營	營官蘇樹森	趙水坑
7	土勇營	提督銜留閩差委總兵桂占彪、營官張仁熙	港孜關
8	恪靖營	營官陳鳴志	火炭坑、烏陵坑

88 對於整個法軍進攻澎湖的過程可參閱《法軍侵臺始末》，頁98~106。

89 《法軍侵臺檔·大事年表》，頁34~35。

90 《劉銘傳文集》，頁123~124。

四、民族英雄墓的歷史

現今位於基隆市中正區的民族英雄墓，是為紀念清法戰爭時陣亡將士所立。不過它不是在戰爭結束之後，由官方主導興建；反而是在約半個世紀以後的日治時期，靠著民間的力量才得以募款動工。如果把它與鄰近的法國公墓做一比較，則可以發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。很明顯的法國公墓是在法國軍方的主導下興建，而日後的管理也是清法外交交涉的議題之一。⁹¹ 然而清廷在事後有為替死難的官兵，建立有如法方般格局的公墓並豎立碑銘加以紀念嗎？從官方留下的檔案來看，完全找不到有類似的記錄。但他們仍需要被處理，所以採取的作法就只是一般的掩埋；而反映的也是一種喪葬習俗的表露，完全談不上帶有任何紀念性質的意涵。⁹² 然而這並不代表清廷沒有自己的紀念方式，把陣亡將士的牌位入昭忠祠奉祀則是普遍的作法。只不過從光緒18年(1892)編纂的《臺灣通志》來看，其中所謂的昭忠祠名冊記載著林爽文、蔡牽、張丙、戴萬生、施九緞各民變，以及開山撫番時陣亡的官兵姓名，就是獨缺清法戰爭時捐軀官兵的名單。⁹³ 因此可以很清楚地說明，即便清法戰爭苦戰八個多月(1884.8.26~1885.4.15)的基隆戰役，在清廷眼中似乎也不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。

爾後到了日治時期，日本殖民當局在全面推動“去中國化，就日本化”的

91 《法軍侵臺檔》，頁478~479。

92 清代的行政法——《大清會典》條列著許多文武官員施政的法源，但從康熙、雍正、嘉慶、光緒朝的版本來看，完全找不到地方官員有義務要為在沙場陣亡的官兵修墳立碑的規定。〔清〕伊桑阿等監修，《欽定大清會典(康熙朝)》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；〔清〕允祿等監修，《欽定大清會典(雍正朝)》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；〔清〕托津等奉修，《欽定大清會典(嘉慶朝)》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；〔清〕崑岡等監修，《欽定大清會典(光緒朝)》，臺灣中文書局。

93 蔣師轍，《臺灣通志》，臺灣銀行文獻叢刊第130種，頁745~922。

政策下，理當不可能替前朝的事蹟立碑紀念。然而有趣的是這原本難以想像的事情，竟在日人統治期間發生了。因此可以很確定的說，現今所看到帶有紀念性質的“民族英雄墓”，絕對是在日治時期建立的，之前完全沒有類似的建物出現過。但現在有一個問題是，既然是在日治時期，那到底是在日治的哪個階段呢？作者遍尋存明治、大正時期的基隆資料，均未找到該墓興建的記錄；僅有在昭和時期，零散見於部分的書籍中(參閱表六)。

表六 日治時期有關基隆資料書目表（陰影部分為有標記“民族英雄墓”的書）

編號	資料來源
1	中央研究院/學術資源/臺灣總都府公文類纂目錄查詢系統 (http://db1.sinica.edu.tw/~textdb/japan/search.html)
2	河野道忠，《基隆築港沿革》（臺北：臨時臺灣總督府工部基隆出張所，大正2年11月〔1913.2〕）。
3	不著編人，《基隆築港誌》（無出版地：無出版社，大正3年〔1914〕）。
4	石坂莊作，《基隆港(大正5年/1916第二版)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5	石坂莊作，《基隆港(大正6年/1917第三版)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6	生野八百，《基隆市ガイド》（臺北：無出版社，大正11年8月〔1922.8〕）。
7	椿本義一，《基隆港大觀（大正11年/1922排印）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8	不著編人，《基隆築港要覽》（臺北：基隆築港出張所，昭和3年4月〔1928.4〕）。
9	加藤守道，《基隆市（昭和4年/1929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概況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2月重印）。
10	基隆市役所，《基隆市勢一覽》（臺北：基隆市役所，昭和4年〔1929〕）。
11	中島新一郎，《基隆市案内》（臺北：基隆市役所，昭和5年12月〔1930.12〕）。
12	簡萬火，《基隆誌（昭和6年/1931排印）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13	伏喜米次郎，《グレート基隆（昭和7年/1932排印）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14	前島知徳，《基隆市名所案内地圖》（臺北：臨時基隆名所案内地圖社，昭和8年/1933）。
15	入江文太郎，《基隆風土記（昭和8年/1933排印）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16	基隆市郡役所庶務課編，《基隆郡勢要覽（昭和8年/1933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郡勢要覽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
編號	資料來源
17	桑原政夫，《基隆市勢一覽》（臺北：基隆市役所，昭和8年1933年）。
18	基隆市郡役所庶務課編，《基隆郡勢要覽（昭和9年/1934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郡勢要覽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19	臺灣軍司令部編，《昭和九年臺灣軍特種演習寫真帖》（臺北：臺北偕行社，昭和9年8月〔1934.8〕）。
20	基隆市郡役所庶務課編，《基隆郡勢要覽（昭和11年/1936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郡勢要覽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3月重印）。
21	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校編，《鄉土讀本—我が基隆（昭和9年/1934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概況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2月重印）。
22	基隆市教育會編，《基隆史（昭和9年/1934排印）》；轉引《基隆概況》（臺北：成文出版社，1985年2月重印）。
23	臺灣經世新報社編，《臺灣大年表（昭和13年/1938第四版排印）》（東京：綠蔭書房，1992年重印）。

從上表六的內容來看，民族英雄墓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昭和7年(1932)伏喜米次郎所著《グレート基隆》一書上。不過該書稱呼為“支那人墓地”。昭和8年(1933)前島知德所繪《基隆市名所案内地圖》，附有一張照片及位置圖；但名稱改稱為“支那人碑”或者“清國人の墓”。同年從桑原政夫所著《基隆市勢一覽》一書的插圖來看，其名稱又改稱為“清國墓地”。⁹⁴直到昭和19年(1944)時人在記錄該墓的近況時，仍以“大公墓”的眼光看待，但墓碑上的文字卻變成“清法戰爭清國戰役勇士之墓”的分別。⁹⁵然而這倒是給了民族英雄墓最早出現時間的線索。由於本省有祭拜無主孤魂的習俗。因此也不排除在戰爭一結束之後，基隆當地的兵民在收拾骸骨立碑之餘，逐漸演變成附近百姓有應公性質的信仰。總之該墓在日治時期其實就有許多不同的稱法。值得注意的是與鄰近的法國公墓相較，在日人的眼中它的重要性是

94 參閱表六・編號13、14、17。

95 黃啟木，〈分類械鬥和艋舺〉，《民俗臺灣(第六輯)》（臺北：武陵出版有限公司，1997年4月），頁79。

否與之等同？根據昭和8年(1933)入江文太郎所著《基隆風土記・基隆的沿革》年表，以及昭和13年(1938)臺灣經世新報社所編第四版的《臺灣大年表》來看，法國公墓的事情一再的出現，但有關於民族英雄墓立碑的事情則隻字未提就已經不言可喻了。⁹⁶再者，日治時期的“支那人墓地”位置與今天“民族英雄墓”的現址是否一樣？這一點從前島知德所繪《基隆市名所案內地圖》，以及桑原政夫所著《基隆市勢一覽》一書的插圖來看是不相同的。該墓在日治時期的位置，恰好在今現址中正路的斜對面，而它的遷移則是戰後國民政府為擴建時所做的。今天在現址上有二塊沿革碑、三塊題字碑，本文抄錄於此提供參考：

民族英雄墓誌

余於中華民國卅八年夏初理基隆市政，父老言中法謀諒山戰後，法將孤拔率艦隊進犯基隆。清廷命巡撫劉銘傳督師防禦，對壘於今之海水浴場一帶。嗣法國三襲淡水均被擊潰，先後斬馘甚重。相持八個月法軍退走，吾圉乃固戰後我陣亡將士忠骸，當場叢葬山麓。日人據臺於此，闢馬路毀墓暴骨。市紳池清洋君等激於愛國熱忱，哀集散骨聚瘞為一塚，刊碑曰清國人之墓。吾臺胞敬其壯烈，輒至墓前祭禱。日人甚惡之，拔碑棄他處，蓋使墓地不辨，藉以泯滅臺胞故國之思。

竊維崇敬先烈，垂範後世，為守土者應有之責。余既悉此事，乃於卅九年改建墓道加築祭臺，並覓得當年池君等所勒石碑於草莽中，重樹阡上以存其真。惟規模不宏不足以發揚先烈成仁取義精神，促

96 參閱表六・編號15、23。

起邦人景仰效法。爰再於海水浴場左側拓地六百五十坪，改建為民族英雄並蒙

總統 副總統暨行政院俞院長分別賜題碑文勒諸貞珉，益足彰其忠烈。斯墓於民國四十六年四月興工，閱二月蒞役。濱海負山，風景優美，忠魂毅魄庶可永奠於斯。民族正氣亦與之長存不朽矣。

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二月〇月

基隆市長 謝貫一 印謹誌

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一月

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五月

民族英雄墓

氣壯河山

光昭日月

蔣中正 印

俞鴻鈞 題印

陳 誠 敬題印

民族英雄墓誌整修記

十八世紀歐洲列強爭霸海上，競相東侵，亞洲地區多遭蠶食。基隆位居北臺要津，為入侵台灣之門戶，久為法國垂涎之地。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六月十五日法國提督孤拔（ANATOLE P COURBET）率艦來犯，引燃戰火。巡撫劉銘傳奉詔督辦台灣軍務，躬赴基隆，率師抵禦，激戰經年，殲敵千餘，而我軍民犧牲雖多，終獲勝利。法國議和，孤拔氣死。當時我兵器落伍，訓練裝備未固，唯一可用者為民心與士氣爾。春熙念此光榮事蹟，正氣凜然，肅然起敬，是以重修「民族英雄墓」永垂紀念。藉使市民瞻仰史蹟之餘，益增其愛鄉衛國之念，是為記。

基隆市長 張春熙 印謹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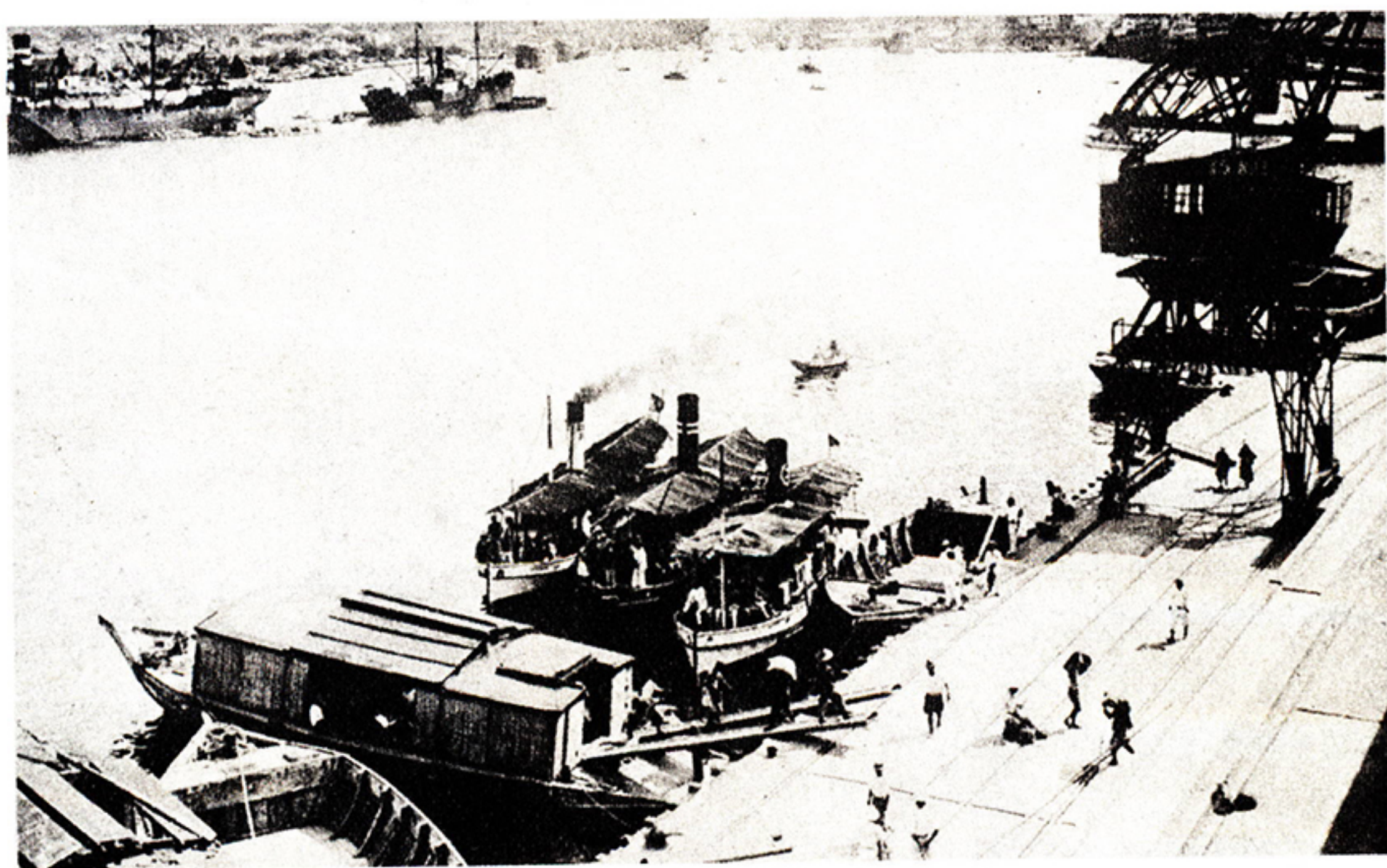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

四、結語

清法戰爭是清末對外戰爭中，少見獲勝多場的戰爭。雖然最後的結局仍以簽訂不平等條約收場，但這對於參與多場戰役的清方官員與將士來說，心中的不平想而知。也因為如此遂變成文人在散文、小說、詩詞創作的絕佳題材。⁹⁷ 後人不察在閱讀之餘，對戰爭的始末與戰役的經過多少會受到影響而失真。本文用了大批的清宮檔案，並參酌對紀念碑(或稱為墓碑)的考證，無非是想努力還原百年前雙方開戰前的準備、令人困惑的數個清代基隆砲台的舊址，以及戰場的原貌而已。

的確，清法戰爭距今已很遙遠了。在這117年當中，基隆也歷經滄海桑田的改變。從原本曲折的海岸、沙灘，也在新的施工方法下成為港口碼頭。而不止是基隆本身，甚至在這百餘年的歷史中，臺灣也歷經了三個不同時期政權的統治—清治、日治、戰後。雖然在這物換星移的大環境，使得景物、事蹟、史實或多或少被埋沒、曲解；但唯一不變的是這些曾經為臺灣奉獻生命的人，不管是土勇還是客勇，不管是官弁還是兵卒，不管是有名還是無名，都扮演起自己該有的角色並力求演出完美。他們的努力與付出，正是我們憑弔這一段歷史的最主要意義吧！

97 廣雅出版有限公司編輯部，《中法戰爭文學集》(臺北：廣雅出版有限公司，1982年4月)。



基隆港內一角